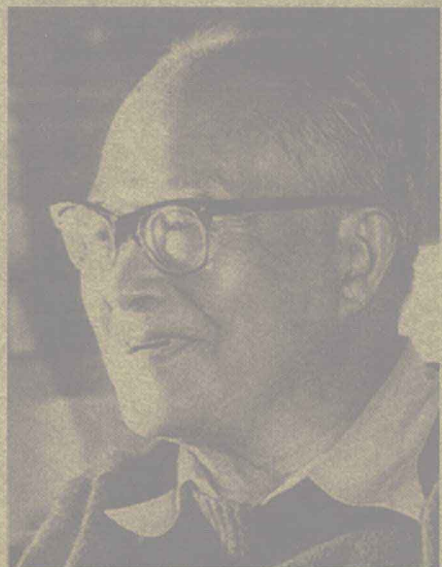


CONGWEN STUDY

4TH VOLUME

2007



从文学刊

第 4 辑

光明日报出版社

从文学刊

第四辑

主 编:张建永

执行主编:简德彬 田茂军

副 主 编:向成国 杨瑞仁

李端生 唐生周

吉首大学《从文学刊》编辑部 编

2007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从文学刊第四辑/ 张建永编著.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8. 4
(吉首大学文学院学者文丛/张景龙, 李端生主编)
ISBN 978-7-80206-580-2

I. 丛… II. 张… III. 文化—美学—研究—湖南省 IV. G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30576 号

从文学刊第四辑

(吉首大学文学院学者文丛)

编 著: 张建永	主 编: 张景龙 李端生
责任编辑: 温 梦	版式设计: 柳 风 黎 阳
责任校对: 徐为正 叶立耀	责任印制: 胡 骑
出版发行: 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崇文区珠市口东大街 5 号, 100062	
电 话: 010-67078243 (咨询), 67078945 (发行), 67078235 (邮购)	
传 真: 010-67078227, 67078233, 67078255	
网 址: http://book.gmw.cn	
E-mail: gmcbs@gmw.cn	
法律顾问: 北京昆仑律师事务所陶雷律师	
印 刷: 北京忠信诚印刷厂	
装 订: 北京忠信诚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 1/32	
字 数: 290 千字	印 张: 12
版 次: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06-580-2	
定 价: 3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沈从文研究

- 沈从文社会理想的现代内涵…………… 谢 昉(1)
- 沈从文边缘心态的双重性及其意义 …………… 田广文(46)
- 沈从文《茶园》自然意象目前的解读 …………… 邱苑妮(57)
- 论沈从文的散文还乡…………… 胡友笋 郑博裴(69)
- 沈从文与《大公报》…………… 朱 丽(79)
- 苗乡弃妇生存命运的思考…………… 姚莉苹 胡 晨(87)
- 湘渝之行笔记…………… 沈 红(96)

黄永玉研究

- 在凤凰欢迎洛夫…………… 黄永玉(121)
- 湘西人和湘西文化
- 在“建设文化湘西：湘西文化名人研讨会”开幕式上的发言
- …………… 黄永玉(124)
- “为了太阳，我才来到这个世界。”
- 黄永玉的人文情怀…………… 刘一友(130)
- 黄永玉先生绘画初探…………… 马树云(135)
- 透视文本：现象学视野下的“刁民”本质解读
- 以黄永玉文本为例…………… 林 皓(142)

乡土美学研究

- 从“乡土文学”到“乡土想像”:乡土母题研究的范式转换…………… 禹建湘(153)
- “湘西”符号的影像建构及其文化意蕴…………… 王 敏(195)

民族文化研究

- “改土归流”时期湘西地区土家族风俗突变现象研究…………… 胡 晨 胡炳章(205)
- 消费社会的兴起与民族艺术的境遇
——一种艺术人类学视角的分析…………… 吴 晓(219)
- 土家族文化的传承与流变…………… 夏大平(234)
- 土家织锦的开发与保护…………… 杨 慧(248)
- 土家织锦传统纹样审美文化内涵探究…………… 盛竞凌(255)
- 土家织锦的原真性保护…………… 吴碧云(264)

民族语言研究

- 湖南古丈县土家族双语使用情况调查报告…………… 杨再彪(274)
- 汉、土家语的接触对土家语的影响…………… 李启群(288)
- 论土家语三音格形容词 $A_{11}^{21}A$ 式的特殊性 …… 叶德书 叶立耀(298)
- 凤凰方言形容词重叠形式…………… 田 洋(311)
- 湖南绥宁关峡平话音系…………… 李艳玲(321)
- 吉首矮寨苗语四音格词的韵律特征…………… 余金枝(329)

文艺与传媒研究

- 网络时代报纸文艺副刊的发展现状及其对策…………… 毛凌云(336)
- 论电视散文的艺术特质…………… 瞿 燕(343)
- 论网络文学的内涵要素…………… 刘 丹(352)
- 广告创意动因初探…………… 张 冀(361)

沈从文社会理想的现代内涵

谢 昉*

沈从文的社会理想一言以概之,就是“合理”。在《长河·题记》中写道,政府对言论控制的现实使人明白,异国的人侵与中国的抗战并不能使中国的现实一下子得到净化,社会问题在除旧布新,渐上轨道的同时,还得容忍随同习惯而存在的许多事实,读书人所盼望的“合理与公正”,恐还得各方面各部门“专家”真正抬头时,方有希望。^[1]在沈从文的文本当中,合理社会的具体内涵主要涵盖政治上推行民主,保证法律的尊严与独立,保障个体生存的自由与权利,围绕这三个方面,沈从文从政府体制、军队、战争、监狱、社会运动、革命等方面进行全方位考察,揭示出官僚特权阶层的腐败,军阀势力的颓废,社会风气的堕落,下层民众的悲惨等等现状,积极地呼吁以理性治国和“开明的贤人政治,正人君子政治,专家政治”。^[1]沈从文社会理想背后的精神理念,就是西方的自由民主政治,他认为,中国的现代化,“除依靠一种真正民主政治的逐渐实行,与科学精神的发扬光大,此外更无较简便方式可采。”^[3]沈从文走上自由民主主义的道路,和他对不合理现实的真切感受分不开。

* 作者:谢昉,博士,中山大学国际交流学院。

一、民主政治

(一)现实政治批判的感性依据

沈从文在1936年《习作选集代序》中说：“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4]沈从文作品背后的沉忧隐痛究竟是些什么？他的热情和悲痛有着怎样的关联？纵观他1924年到1949年的创作，我们可以看到沈从文的沉忧隐痛为的是不合理的社会现实之下存在的种种不合理的生存现象。他在多处表白他的心总是为人生的现世光景而跳跃，看重人生的此在与生命，但社会的不合理，使人无法在有限的此在中实现他对生命所寄予的厚望，“这个国家因为前一辈不大振作，自私而贪得，愚昧而残忍，使我们这一代为历史担负那么一个沉重担子，活时如此卑屈而痛苦，死时如此糊涂而悲惨。”^[5]这种生存环境很难促动个体去追求沈从文所推崇的生命“意义”与深度，很难使他们在食与性两种基本愿望以外去玩味人生，理解人生，因此个体也就很难远离动物的单纯，去用推理归纳方式，或单凭梦幻想象，创造出若干抽象原则和意义。^[6]大家都在食与性的动物性中跌打滚爬，也就很难实现沈从文所谓的“优美，健康，自然”的人性理想。沈从文一再声称自己的性格充满悲剧性，就是因为对万汇百物充满太多的爱与热情，而现实又是如此不堪，《长庚》中说：“我人并没有衰老，何尝消沉？惟沉默已久，分析一番，也只是人太年青一点必然现象。我正感觉楚人血液给我一种命定的悲剧性。生命中储下的决堤溃防潜力太大太猛，对一切当前存在的‘事实’、‘纲要’、‘设计’、‘理想’，都找寻不出一一点证据，可证明它是出于这个民族最优秀头脑与真实情感的产物。只看到它完全建筑在少数人的霸道无知和多数人的迁就虚伪上面。政治、哲学、文学、美术，背面都给一个

‘市侩’人生观在推行。由于外来现象的困缚,与一己信心的固持,我无一时不在战争中,无一时不在抽象与实际的战争中,推挽撑拒,总不休息。沉默正是这战争的发展。”^[7]沈从文一生都感觉到自己的命运充满悲剧性,而造成这种悲剧性的根源之一就在于现实的不合理。

这种现实的不合理性是在沈从文成长的过程中慢慢渗透到他的心灵深处的,所以沈从文对现实的反抗是决绝的,如同鲁迅,没有妥协,没有苟且,他们的深刻与孤独都缘于对中国的现实与人心理理解得太深太透。

在《我怎么就写起小说来》中,沈从文描述了他从幼年到青年时代的生存环境。小时候听祖母辈讲“长毛造反官兵屠城”的故事,听父亲讲华北人民反帝斗争的壮烈活动和悲惨遭遇。到了八九岁时,亲眼见过“辛亥革命”在当地的种种。虽然本地的革命规模不怎么大,但给他的印象却非常现实,眼见参加攻城的苗族农民,在革命失败后,从四乡捉来有上千人死亡,大量血尸躺在城外对河滩上。《从文自传》中作者对这次人生教育,作了如下记述:

我那时已经可以自由出门,一有机会就常常到城头上去看对河杀头。每当人已杀过赶不及看那一砍时,便与其他小孩比赛眼力,一二三四屈指计数那一片死尸的数目。或者又跟了犯人,到天王庙看他们掷筊。看这些乡下人,如何闭了眼睛把手中一副竹筊用力抛去,有些人到已应当开释时还不敢睁开眼睛。又看着些虽应死去还想念到家中小孩与小牛猪羊的,那分颓丧那分对神埋怨的神情,真使我永远忘不了。

我刚好知道“人生”时,我知道的原来就是这些事情。^[8]

后来光复胜利,旧日皇殿改成陆军讲武堂,不多久,又眼见蔡锷为反对袁世凯作皇帝,由云南起义到湘西麻城芷江一带作战。这时沈从文由于家境中落,母亲送他去当兵,在《卒伍》中对此有所表述:“那么一个小小的人儿,也得为命运卷到生活旋涡里来,尝味那生活的苦辣,在我自己倒正因为小却一点不知道!如今却只给我痛哭到这回忆上。有人从大家族中把家从中落到破产么?有人在小孩子时正当着这个顶坏的命运么?从这个来的,他都能体会到那种情形。”^[9]鲁迅在《呐喊·自序》中也有过类似的论述,这种境遇为他们日后的平民主义奠下了基础。

沈从文卒伍生活开始的时候,正值袁世凯倒台,各地大小军阀纷纷拥兵自立,湘西地方势力也在沅陵组成“联合政府”,集合了三派军事力量。由于联军成分复杂,人数庞大,,常因争防地发生摩擦。沈从文所在第二军第一支队不久就被派往芷江境内的榆树湾进行“清乡剿匪”。四个月后又移防怀化镇,历时一年多。移防的目的既然叫“清乡剿匪”,所以在这漫长的日子里,军队唯一可做的事就是杀人弄钱。他们一边鼓励乡绅团总抓人,一边又抓团总乡绅“吊肥羊”,有时也抓杀逃兵。无论杀人者还是被杀者都处于极端的麻木状态。每当有人被处决,围观的士兵总是重复同样的话题:那汉子下跪的姿势对不对,做匪有没有经验……这种“围观”者的蒙昧,鲁迅、王鲁彦在他们的作品中都有所表现。就被杀者而言,大家全把死亡的命运交付于“运气”,或者说“命”,或者说“神”,没有理性的法律、制度来保障个体生命的合法性,草菅人命成了司空见惯、见怪不怪的生存现象。^[10]少年的沈从文“想不出这些做官的有道理或有权利这么作。一切在习惯下存在的我认为实不大合理。”这种经常性的杀戮使沈从文对辛亥革命发生了怀疑,“难道辛亥革命就是这么的革下去?”^[11]在这种无常的生存境遇中,生命偶在性的凸显,引起了沈从文对生命的关注,为他日后对生命哲学的接受奠定了基础。

由于意识到自身所处环境的不合理,沈从文和自身所处的环境有了距离感,越来越和周围的人缺少共同的语言和情感,但还没有发展到有意识地去反抗或否认现存的不合理,也不知道如何改变自己的命运,所能做的就是通过读书坚守自我,“首先学坚持自己,来抵抗生活行为上的同化和腐蚀作用。反映到行为中,即尽机会可能顽强读书,扩大知识领域。”^[12]这种在逆境中“坚持自己”是沈从文生命中独立人格的根基。

由于一个偶然的的机会,沈从文在一个亲戚那儿接触到林琴南翻译的小说,足有一箱子,“狄根司的小说,真给了我那时好大一份力量!”^[13]这可算得上是沈从文第一次接触西方文学和现代小说。书本和现实的两厢对照,给他朦胧的反抗意识提供了一个启示,可以把写作作为反抗不合理现实的一个手段。先从写诗入手,周围人的生活成了他讽刺的对象,这些人物,从早到晚陪上司玩牌,吃点心,抽大烟,喝茅台,打了几个饱嗝后,又开始玩牌,“过日子永远是这么空虚、无聊。日常行为都和果哥里作品中人物一样,如漫画一般,甚至于身体形象也都如漫画一般局部夸张。这些人都读过不少书,有的在辛亥时还算是维新派,文的多是拔贡举人,武的多毕业于保定军校,或湖南弁备学校。腐化下来,却简直和清末旧官僚差不多,似乎从没思索过如何活下来才像个人,全部人生哲学竟像只是一个“混”字。跟着老师长混,“有饭大家吃”,此外一切废话。”^[14]这种以现实人生作为原型以及对知识分子持审视态度的写作态度在后来的小说创作中保持了下来。

就在沈从文情感无出路,在一种孤立苦闷中挣扎的时候,五四的余波冲击到了这个边疆僻地。五四所宣扬的种种理性思潮,自由,平等,民主,个性解放,人的文学观念在这儿传播开来。地方上由于办新学,办报馆,聘请了许多思想先进的年青教员。国内新出版的文学和其他书刊,如《改造》、《向导》、《新青年》、《创造》、《小说月报》、《东方杂志》,和南北大都市几种著名报纸,都一起到了当地

中小学教师和印刷工人手中,因此也辗转到了沈从文手中。正在发酵一般的青春生命,为这些刊物提出的“如何做人”和“怎么爱国”等等抽象问题燃烧起来。这使沈从文有机会用些新的尺寸来衡量客观环境的是非,也得到一种新的方法、新的认识,来重新考虑他自己在环境中的位置。

由于五四新文学提倡以文学改造人生从而改造社会的文学功能,这给沈从文提供了一个人生进取的方向。沈从文从五四新书刊中提出的很多问题,应该有什么样的社会理想、什么样的人生态度这一类关涉个体精神出路的问题受到刺激和鼓舞,他的思想被引入了社会的整体构想,个人和社会,文学革命和社会变革之间的关系,如何才能建立一个新制度等等宏大的命题开始引起沈从文的思考。他认为在动摇旧社会,建立新制度这一点上,小说比诗歌更具有表现力,更容易领会共鸣。在接受五四新文学之前,沈从文已看过许多新旧小说,再来看当时的白话文小说创作,总觉得缺乏艺术魅力。沈从文觉得如果将自己生活中所经历到的或保留在印象中的人和事,切割任何一部分下来,都会比当时报刊上所载的新文学作品生动深刻得多。^[15]再加上当时报刊杂志上对外国文学进行的大量的翻译介绍,特别像契诃夫、莫泊桑等短篇小说的介绍,这些十九世纪的有世界性的文学作家,在他们的时代环境中,通过长期的辛勤勤劳,和传统政治势力及宗教迷信作反抗斗争,因而与十九世纪及二十世纪初期的世界文化史、社会思想发展史,发生紧密联系的情形,使沈从文心向往之。深信国家的真实进步,有赖于切实有用的知识代替专横霸道的权力,理性代替迷信,而文学作为启蒙的手段,更容易使人得到启发,深信通过文学,在读者心中注入社会重造的观念,是一个必然有效的方式。^[16]大量的西方文学的阅读增加了沈从文对于小说含义特别是小说技巧范围广阔的理解的同时,也使他产生了一个高远的“理想”,“希望做一个和十九世纪世界上第一流短篇作者竟短长的选手。私意认为做作家并不

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写几本书也平常自然,能写得比这一世纪高手更好,代表国家出面去比赛,才真有意义!这种想象来源,除了一面是看过许多小说,写得并不怎么好。其次即从小和野孩子爬山游水,总是在一种相互竞争中进行,以为写作也应分是一种工作竞赛。”^[17]只有经典的文学才担当得起彻底瓦解旧制度的重负。在这一点上他认识到,自己的所愿近于创始,前路悠远,必须摆脱近功小利的诱惑,来作中国新文学发展的殉道者。^[18]沈从文对于文学改造社会、人生的艰难性的预计,正是他立足于现实,独立思考,不盲目乐观,不浮夸近进,坚守五四启蒙精神的表征。

在接受了新文学所灌输的种种关于个人的、国家的现代理念,尤其是产生出要和十九世纪西方作家一竞短长的伟大心愿后,沈从文获得了创造一种新生活的充分理由,再加上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病和好友的丧生,使他增加了对生命无常的感知,最终促成了他走出湘西,自由地处置自己生命的愿望。

沈从文来北京的目的是期望学习文学和文化,以便实现自己的作家梦,但最先具体接触到的,却又是鲜明著目的政治。旧军阀总崩溃前夕,皖、直、奉、豫、晋以地方为单位的北方军阀,用民众作赌注,内战不休,走马灯一般此来彼去。另一群来自各省,代表地主、豪绅、官僚、流氓、买办利益的八百国会议员,又全部寄附于这个政治现实下,分成若干小派系,纵横离合,争吵打闹。国内因内战连连,国家财富多转到帝国主义者军火商人手中,成为炮灰。老百姓穷困万状,无以为生。上层社会却终日在讨坤角,庆大寿,办盂兰盆会等一类事情上努力。在新文化的发源地,这种种现象与沈从文的期望以及他所接受的理念相去甚远,这些既“加深了我对政治二字的厌恶,也妨碍了我后来对政治更深一层的理解。”^[19]

在长期的写作生涯中,面对种种不合理的社会现象造成的人性扭曲与生命损耗,沈从文感到悲哀,可又无可奈何,“多力的,强健的,有生气的,守住一个理想勇猛精进的,全给早早的死去了。

却留下多少早就应当死去了的阉鸡、懦夫、与狡猾狐鬼，愚人妄人，在白日下吃、喝、听戏、说谎、开会、著书、批评攻击与打闹！想起生者，方使人悲哀！”^[20]但他毕竟是个深悟而且坚守五四启蒙精神的“战士”，（沈从文在多处称这种为理想、追求而与生活中的愚昧、庸俗进行对抗的行为为“战争”）所以他又体现出普罗米修斯的勇气：“人既死了，为做人责任和理想而死，活下去的徒然悲痛，实在无多意义。既然是战争，就不免有死亡！死去的万千年青人，谁不对国家前途或个人事业，有种光明希望和美丽的梦？可是在接受分定上，希望和梦总不可免会破灭。或死于敌人无情炮火，或死于国家组织上的弱点，二而一，同样完事。这个国家因为前一辈不大振作，自私而贪得，愚昧而残忍，使我们这一代为历史担负那么一个沉重担子，活时如此卑屈而痛苦，死时如此糊涂而悲惨。更年青一辈，可有权利向我们要求，活得应当像个人样子！我们尽这一生努力，来让他们活得比较公正合理些，幸福尊贵些，不是不可能的！”^[21]这种牺牲精神在他的小说中也多次得到表现：“我们若要活到这个世界上，且心想让我们的儿子们也活到这个世界上，为了否认一些由于历史安排下来错误了的事情，应该在一分责任和一个理想上去死，当然毫不踌躇毫不怕。”^[22]

鲁迅先生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出于对青年人的关爱，曾发出过“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掙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的呼声。^[23]沈从文的“我们尽这一生努力，来让他们活得比较公正合理些，幸福尊贵些，不是不可能的！”^[24]与之充满了一样的自我牺牲，同时也是对不合理现实的痛切批判与对合理社会的深切向往。沈从文一生的追求都缘于对既存现实的不满，而现实并没有因为沈从文的追求而有所改观，在这种理想与现实、个体与社会的对峙中，沈从文以一种节制、冷静的抒写方式表现社会体制、道德对自然欲望的压抑，对人性的扭曲，对生命的剥夺，对丑恶的纵容与包庇，在貌似

冷峻的背后,可以看到沈从文对人的自然权力的肯定,对人性的呼吁,对生命的讴歌,对丑恶的痛恨,诚如沈从文自己所说,期望有人会在他的这个“乡下人的作品中,发现一种燃烧的感情,对于人类智慧与美丽永远的倾心,康健诚实的赞颂,以及对愚蠢自私极端憎恶的感情。”^[25]所以沈从文在他的作品中一遍遍地表达着他对“合理与公正”的社会理想的期盼。

(二)政治理想生成的文化氛围

不合理的封建朝代政治迫使沈从文去寻找一条能使国家、民族获得新生的社会体制。在当时的知识界,很多知识分子都在寻求实现一个“合理与公正”的社会理想的现实途径,以胡适为代表的一批欧美知识分子坚信只有民主政治才是保证中国走出现实泥潭的有效方法。沈从文对民主政治理念的接受,主要缘于这种政治理念宣扬的社会主张契合了他的自由理想与政治理想。胡适所持的自由民主政治观一方面对沈从文政治理想的形成具有启发作用,另一方面沈从文又以文学的方式传达了自己对政治的理解,从而在客观上形成了以沈从文为首的自由主义作家在文学领域和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政治论域进行现实政治批判的态势。

胡适作为白话文运动的倡导者与新文化革命的推动者,可以说是沈从文的启蒙者之一。虽说一个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一个是文坛新秀,但有一件事可以肯定,胡适很早就知道沈从文并且对他印象不错。胡适和徐志摩关系很好,而徐志摩又是最早对沈从文的作品作出嘉评的一个人,沈从文和徐志摩的深厚友情可以从沈从文的多篇回忆文章中感受到。所以有了后来上海期间徐志摩托胡适帮沈从文寻一个教职,胡适当时正任吴淞中国公学校长,便让沈从文到中国公学任教。沈从文在上海这段时间(1928年——1930年夏)正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国民党意识形态进行有力批判的时期。1928年3月《新月》月刊由一群受过西方教育又有基

本文学爱好的知识分子创办,由于梁实秋、潘光旦、罗隆基以及胡适的影响,《新月》成了讨论政治的著名论坛。沈从文在《我的学习》中回忆到:“为学习文学和文化,自以为工作宜属于思想领域而非政治领域,所以对当时政治现状绝望,但属于社会科学范畴内的社会思想学说,却因零散阅读,从那些作品中,感应到一种洋溢的哲思和诗情。明白一切社会思想著作之所以引人入胜,使世界上千千万万读者,能从作品中得到热情的鼓舞,实由于这类作品,也是科学也是诗。”^[26]沈从文的阅读兴趣非常广泛。作为一位具有深厚社会使命感的作家,自觉地从对不合理现实的反思和社会思想著作的阅读中形成了自己的政治理想。他这个时期以及稍后一段时间的很多作品都发表在《新月》上,《绅士的太太》(1930.3.《牛》(1929.9.)《落伍》(1929.5.)《我的教育》(1929.9.)《道德与智慧》(1931.4.)《旅店》(1929.2.)《阿金》(1929.1.)《灯》(1930.2.)《若墨医生》(1932.10.1.)《猎人故事》(1933.3.1.)《月下小景·医生》(1932.12)其中很多篇章都显示出他的自由主义政治观,有些简直就可以看成政治寓言,如《若墨医生》。

沈从文认为:“国家进步的理想,为民主原则的实现。”^[27]关于民主政治的具体构想,主要就是国家统一,结束武力争霸,进行社会改革,保证公民的生存权与发展权,公民享受参政议政之权力,实现“专家政治”。这些观点代表了当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普遍的政治期望。

当时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联名发表文章,提出有关南北政府的重新统一,重建“合法”的国会机构,起草永久性宪法,解除武装,改革官僚制度,提出公共财政预算和会计制度等等问题的建议。这些提议反映了不断更迭的军阀政府给中国名义上的共和制度所带来的方方面面的弊病:由国外贷款和沉重的国内捐税所维持的庞大的“私人”军队,不计功劳与能力而可保持职位的臃肿的官僚机构,国会的程序也旨在适合那些依仗武力和贿赂施展其野心的

强权人物的便利,缺乏起码的可用来衡量政治行为的基本法律,完全无视批评者的意见,也无视他们认为有权去统治的人民的意见。^[28]中国知识分子自 1898 年戊戌变法以来,一直忽略非政治力量,一直把希望寄托于直接的政治改革,现实决定了他们必然失败的命运。而 1919 年的五四运动使知识分子看到了新的希望,“正是这些非政治的势力——学生、商人、游行与街头演讲,以及联合抵制购买——起了作用并取得了胜利。这是一个伟大的启示并且产生出了新的乐观主义。”他们意识到在政治之外,知识分子还有很多事可做,“我们还有教育群众、解放妇女、改革学校、发展国内工业、改造家族制度、反对旧的与这时的观念、废弃荒谬有害的偶像,以及纠正许许多多社会的和经济的错误等等事情要做。正是通过这些新的活动途径,带着再觉醒的希望与活力的年轻中国现在才正在为中国的民主重建一个新的基础而缓慢地但却稳步地工作着。”真正的改革决不是通过与流氓恶棍的妥协这类手段来实现的,因为改革不是从这种意义上来说的政治问题,而是一个远为广泛的社会与思想问题的综合体。民主制度不仅是一个具体的政治制度体系,而且是一种有益于维持某一特定社会状况的心态。一个民主社会的创造在本质上是一项思想的成就而不是一项政治成就。“民主是不能仅仅通过政治的变革来给予保证的……民主……不多不少正是所有民主化的和正在民主化的力量的总体,这包括社会的、经济的、道德的,以及思想等诸方面的力量。构成中国这些新运动的指导原则之一的也正是这种认识。”^[29]

沈从文“专家政治”的主张极有可能来源于当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政治讨论。胡适 1923 年就阐释过,现代政治的关键问题并不是权利的范围,而是行使权利的方式。他反对独裁主义,因为独裁主义的方法不适于现代政治过程的复杂性。在二十年代末,胡适这个观点得到了罗隆基的支持,并且罗隆基吸收了哈罗德·拉斯基的见解,在《新月》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认为最终评判政府

的并不是各个政府的思想主张,而是它们行政程序的性质。罗隆基从拉斯基那里借来的强调行政才能和“专家政府”的思想,与胡适对于“政治”的严格定义保持了一致。^[30]沈从文“专家政治”的观点有可能受此启发。

通过以上的简单分析,可以看到沈从文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知识分子,他的政治-社会理想的生成离不开当时知识分子群体所形成的政治文化氛围,体现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现实政治迫切需要改革的集体需求。沈从文在这个现实与理论的平台之上,通过文学表达了当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政治诉求。

沈从文并不完全排斥文学对政治的表达。他在1928年发表的《杂谈六》中说,“文学的结果,若是当真走到真与美的一条路上去的,则我们也应相信文学的思想至少应当把它放在与政治行为上平行。”^[31]也就是说,文学的真与美并不排斥政治性的思想内容。沈从文小说中的政治观点恰恰表现了沈从文作为一位具有人类关怀意识与民主思想的作家所表现出的启蒙精神。艺术和表现政治观念并不存在矛盾,关键看作家对政治予以怎样的表现。沈从文非常推崇安徒生,因为安徒生具有非凡的想象力与转化技巧,能够将悲剧情感转化为童话世界。沈从文中后期作品的成熟,主要缘于艺术技巧的成熟与思想情感的深厚,尤其是转化现实生活的能力使他超越了早期作品的倾诉性与亲历性,从而使他的作品获得了普遍性的意蕴。

(三)民主理想的文本阐释

沈从文的民主理想就是实现一个宪政的、公开的、有计划的政府,这个政府要能够摆脱特权意识,尊重个体权利与自由,为社会全体谋求福利。沈从文在他的小说、散文和政论中都直接或间接表达了自己的政治理想。沈从文正是在这种政治理想的基础上去审视现实社会。从最上层的总统、议会的混乱腐败到最下层官僚机构的鱼肉百姓都被他一一摄入眼底,所以沈从文一再表明自己